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罗桑开珠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 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 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 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 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 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 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关键词 佛教; 吐蕃; 社会地位; 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0) 02-0123-06

吐蕃王朝是藏族先民建立的古代国家政权, 它的建立使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都发生重大变革, 使藏族社会进入了一个强盛时期。吐蕃王朝共有10位赞普, 除了朗达玛外, 其余赞普都积极支持和发展佛教, 使其成为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 吐蕃佛教不仅占据了国教的宗教地位, 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一、吐蕃佛教的政治地位

公元7世纪30年代, 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藏族社会由部落割据的社会形态进入了统一的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对藏族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 罢免了位高权重, 桀骜难制的强臣, 从而大大提高了君权, 建立了赞普专制体制, 采取恩威并施, 罢免与安抚并举的措施, 进一步稳定了动荡的吐蕃社会。同时进行对外开放与交往, 吸收和借鉴先进文化, 极大地促进和发展了吐蕃社会的经济、文化。其中支持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举措。

由于政治的需要, 松赞干布先后迎娶了五位王妃, 其中前三位是为了安抚归顺于吐蕃王朝的

其他部族势力而进行的联姻。后二位是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 她们与藏王松赞干布的联姻也是古代社会两国交往过程中的政治产物。后两位公主来自于佛教十分兴盛的国家, 她们笃信佛教, 带来了佛像、佛经和礼佛僧人。吐蕃为两位公主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在吐蕃的初传阶段虽然得到了王妃的参与和赞普的支持, 同时也遭到本土宗教苯教的强烈反对。如众多藏文史籍中记载“白昼修建的佛殿, 夜晚则被鬼神所破坏”。说明了当时两种宗教和文化的摩擦与冲突。

松赞干布还依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吐蕃法律, 在拉萨都市建造中修建佛教四如寺来镇魔除怪, 而没有启用本土宗教苯教的教法仪轨。松赞干布还要求“尼泊尔工匠塑造一尊如同国王自己相貌特征相似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像”。^[1]这种“佛王合一”的造像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即王佛融合, 不可反之。这就反映了佛教不仅传入了吐蕃, 而且得到了吐蕃社会统治者的支持, 同时佛教又在吐蕃争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基础。

松赞干布之后的贡松贡赞、芒松芒赞和都松芒波杰三代赞普期间, 实际权力被噶氏家族控

(收稿日期) 2009-06-03

(作者简介) 罗桑开珠(1955-), 男(藏族), 青海玉树县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

制，佛教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赤德祖赞时期，由于摆脱了外族权臣的控制，又受金成公主的影响，佛教又重新得到了王室的支持。如重新布置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设施，从汉地邀请了许多和尚到吐蕃供养佛法。公元739年，吐蕃发生瘟疫，金城公主也死于此病。支持苯教的贵族们借口说这是外来僧人引起本土鬼神发怒造成的，于是发动了驱僧事件。但赤德祖赞始终未改扶植佛教的思想，晚年派桑希^[1]等4人到汉地取经。从这些措施当中不难看出，佛教在王室家族中的需求和地位并没有变。

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佛教赢得了较高的地位。虽然赤松德赞幼年时，由贵族大臣辅政，发动了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但是，赤松德赞执政后仍然力图发展佛教，他对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和佛教的本土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首先排除反佛势力，坑埋了大臣玛尚仲巴结，把功臣达扎陆贡流放到藏北高原，宣布废除禁佛令，恢复庙堂的宗教活动和译经工作。玛尚仲巴结和达扎陆贡尽管都是使吐蕃王朝走向鼎盛的功臣，但是在兴佛与废佛的分歧中，这些功臣们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赤松德赞亲自策划领导修建了专为吐蕃本地出家僧人修学佛法的道场——桑耶寺。随着桑耶寺的建立，藏族出家为僧的序幕也从此拉开。藏族历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人，史称“七觉士”。他们都是王公贵族的后裔，之后又有赤松德赞妃子没卢氏及其他贵族妇女约30人出家为尼。从出家僧人的身份地位之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吐蕃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待遇和宗教地位、社会地位。

赤松德赞又通过举行佛苯教理辩论的形式，使统治藏族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千余年的本土宗教苯教退出历史舞台，并要求苯教徒或弃苯改信佛教，或放弃宗教职业做纳税百姓；既不愿改教，又不愿当平民者，流放边远地区。同时将苯教经籍或毁或埋，禁止流通，让佛教取代苯教，成为吐蕃社会唯一尊奉的宗教。

“赤松德赞还曾命僧人担任大臣之职，以分减世俗贵族大臣的权势”，^[2]这就开创了佛教僧人参与世俗社会政治并掌握政权的先河，极大地抬高了佛教僧人的政治地位。

赤德松赞（俗称赛那累）也采取了众多的弘扬佛教的措施：他特别命令要优礼僧侣“对已经

出家的僧人，不许再受别人的奴役，免征他们重税，不让他们做体力劳动者。他让长子臧玛出家为僧，还设置‘钵阐布’（大僧臣），其地位排在王妃、小邦王子之后，众大伦（宰相）之前”。^[3]使整个佛教僧人脱离了平民阶层，将佛教高僧的地位抬高到贵族大臣之上的贵族行列。

赤德松赞还规定：“赞普的子孙从幼年到执掌国政，都要以佛教僧人‘善知识’为师，新立王妃和新任大臣都要在立誓信佛的人中选立和任命”。这样第一次将是否信奉佛教成为吐蕃王朝立妃和选拔官吏的先决条件和基本政治原则。吐蕃佛教第一次获得了世俗社会的教育大权，对后来藏族社会的教育被寺院把持和包办的现象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举措从表面上看是使吐蕃臣民受到佛教思想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崇佛弘法之人。实际上不仅改变着整个吐蕃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使佛教思想开始渗透和影响到藏族社会的全部生活及其古老文化，同时也延伸到吐蕃的政治领域之中。

赤祖德赞（热巴巾）治理朝政期间，将吐蕃佛教推向登峰造极的境地。他极度尊崇僧侣。他在自己的发辫上系有两条长丝带，将丝带铺在僧人座位上，请僧人坐于其上，以此表示他对僧人的尊敬和对佛教的虔诚。并制定苛律惩治不满僧侣之人：若“以恶意指僧者断其指，以恶言训僧者割其舌，以仇目视僧者剜其目，偷窃寺院、僧侣财物罚80倍赔偿”。^[3]僧侣在政治上享受了特殊待遇。热巴巾承袭赛那累的做法，继续在王朝设立佛教僧人大臣，把军政外交大权交给僧官钵阐布贝吉允丹掌管，并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大臣，直接干涉内外军政大事。如822年举行的“唐蕃舅甥和盟”，就是由僧臣贝吉云丹与入蕃的唐使刘元鼎共同主盟的。可谓这时候吐蕃佛教的政治地位推到了赞普之下，万人之上、众臣之首。这种现象对后来藏族社会的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吐蕃佛教的经济地位

一般而言佛教僧侣远离世俗生活，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生活来源依赖于化缘乞讨、信徒布施和统治者、富商及其他地方势力的供养。大多数的佛教团体及其僧侣的生活比较艰苦，尤其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颇难建造起寺院及配备

所需的各种设施。吐蕃佛教一开始就得到了吐蕃王朝的支持。吐蕃佛教并不是佛教僧人传播进来的，而是统治者在治理朝政过程中政治所需而被接纳支持、弘扬信奉起来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她们分别带来了佛像及礼佛僧人。松赞干布为了满足两位公主及其随从人员的宗教信仰，为供奉诸圣像而修建大昭寺、小昭寺，并给予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除著名的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以及山南地区的昌珠寺在内的18座寺庙外还修建了许多修行道场。各寺所供奉的圣像有佛、菩萨、明王、金刚、佛母等。假如没有吐蕃王朝在经济上的支持，这些寺院建筑及造像工程难以完成。

710年唐蕃再次联姻，金城公在赤德祖赞的支持下积极扶持困难中的吐蕃佛教，恢复和改善佛教在吐蕃的处境，尤其是对汉地佛教在吐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她派人将封藏在小昭寺的文成公主携来的释迦牟尼像迁到大昭寺，赤尊公主携来的不动佛像供于小昭寺，并派汉僧主持寺院，供养日常香火。当时于阗的一些佛教僧侣由于动乱逃至吐蕃避难，金城公主建议收容、供养他们，为他们修建了瓜曲等（今西藏桑耶寺附近）7座寺庙进行安置。上述情况说明吐蕃王朝不仅接纳了佛教，而且在经济上供给了所需一切。

在赤松德赞的领导和支持下，吐蕃佛教从外向型向内向型转变发展，即信徒本土化；语言本土化；造型本土化；经济独立化方向发展。在这个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费用全部都由王朝提供或解决。许多藏文史籍记载说：修建桑耶寺是由莲花生大师选址，寂护设计，赤松德赞亲自主持奠基，历时12个春秋才竣工的，赞普还给与了丰厚的财产。

赤松德赞根据佛教戒轨的要求，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了12位授戒师，为藏族“七觉士”剃度并授比丘戒。这是藏族历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人，继后又有不断出家的藏族僧人，就在此年中陆续为僧者达305人。他们的生活费用和佛事活动所需经费皆由朝廷统一安排。此后给桑耶寺“拨属民150户，作为供施之源，另规定‘三户供养一僧制’，全寺共有属民1065户。此外，发给堪布每月青稞75克、每年酥油1100两、1套衣服、1匹马、4刀纸3块墨。25名瑜伽行者及

13位教师每年每人青稞55克、酥油800两。25名学经僧每年每人青稞25克、衣3件，其余僧人每年每人青稞8克等。当时共有僧人300多，除属民外，每年又从吐蕃王朝领取粮食达5428克，足够543个奴隶一年之食；39位教师、瑜伽行者等每年领酥油31500两，可供181个奴隶吃一年”。^[4]有力地保障了僧侣的生活来源，提高了僧侣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赤松德赞时期开始佛教高层僧侣的生活待遇及经济收入进入了贵族阶层，同时可以看出当时寺院组织管理是王朝领导支持下的堪布负责制，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实体。

由于赤松德赞对吐蕃佛僧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吸引了更多的藏人出家为僧。到了牟尼赞普时政府财政无力负担，赞普为佛教谋划供养进行三次平均财富而触及了王公贵族的利益，遭到暗杀。

赤德松赞（俗称赛那累）继赞普位。他对佛教“三宝”甚为恭敬，维修和扩建了历代赞普创建的寺院及佛殿，同时在大昭寺和桑耶寺等寺院建立了12处讲经院，在耶尔巴和青浦等圣地建立了12处修行院”。^[5]赤德松赞还规定，凡有三宝的地方，所需供养不得减少。

赤祖德赞执政期间吐蕃佛僧的生活待遇及其经济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他“兴建寺院、道场、讲院等30座”。^[6]据传至赤祖德赞时期，吐蕃王臣在吐蕃境内外已建造1008座寺院，还有用玉石材料建造的寺院。在拉萨河上游南岸修建了吐蕃历史上著名的九层金顶宫殿，史称“乌香多宫殿”，其实是寺宫合一的建筑，其底部三层是用石料建造的，居住着王臣；中部三层是用砖料建造的，供养着僧侣；上部三层是用木料建造的，供奉着本尊佛像。同时他规定每7户平民要负担供养一个僧人，即所谓“七户养僧”制度；还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一部分僧人变成拥有寺属庄园的地主。大臣蔡邦·多日所建江浦寺的碑文说“赞普天子赤祖德赞恩诏，在堆珑江浦地方建寺，立三宝所依处，住有比丘众人，作为寺院顺缘之奴户、土地、牧场、供器、财物、牲畜等一并交付寺院，作为赞普常川不断的供养”。这说明政府拨给寺属庄园的制度已经确立。

吐蕃王朝从政府供养佛僧发展到由庶民三户

供养一僧制，又提高到七户供养一僧制，从赤松德赞以前由政府负责修建寺庙及其设施和调配寺院所需劳役发展到直接划拨寺属奴户，到了赤祖德赞时进一步提高到划拨奴户、土地、牧场、供器、财物、牲畜等范畴。它标志着佛教僧团在吐蕃社会中已从最初的一个单纯的被供养群体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的属民与土地的经济实力集团。吐蕃的僧侣集团不仅拥有了土地和人口，而且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僧侣占有土地和人口的合法性。吐蕃寺院开始超越了完全归属和依赖于世俗政府的现象，逐步走向由堪布负责的拥有独立经济实体的寺院集团。假如没有吐蕃王朝从经济上不遗余力地提高佛教僧侣的社会经济地位，扶持寺院经济的发展，吐蕃佛教生存并发展，因为它们没有像后弘期那样的群众基础进行供养和布施。

三、吐蕃佛教的宗教地位

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传入吐蕃之前，吐蕃本土已有苯教。苯教在藏区经历了笃苯、恰苯和觉苯传播发展时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信奉人群。苯教巫师大都在各自所处的部族、地方势力和王朝中扮演着谋士的角色，并参与主持百姓和统治者组织的各种活动、集会中的宗教仪式。可以说当时吐蕃社会的宗教及文化完全在苯教控制之中。佛教之所以能够取而代之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理论学说适应了吐蕃王朝的执政理念。

佛教取代苯教成为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是始于赤松德赞执政时期，赤松德赞为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他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使印度佛教向本土化转变的，使佛教取得吐蕃正统宗教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内部消除反佛的贵族大臣实力，2、迎请印度佛教显密大师传法，3、修建佛僧修学佛法的桑耶寺。5、取缔或打击本土宗教苯教，6、让王子和贵族大臣盟誓信奉佛教，7、去汉地佛教顿悟派兴印度佛教中观渐悟派。8、培养佛教人才，翻译佛经。9、保障寺院经费开支和僧侣的生活费用。经过赤松德赞的大力兴佛，佛教在吐蕃得到了空前发展。同时佛教开始向本土化转变和完善，积极吸收苯教的宗教仪轨和宗教仪式，将苯教的神祇册封为佛教的护法神。也就是说赤松德赞弘扬佛教和莲花生传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即采取了印度佛教本土化的措施。印度佛教向

藏族文化靠拢是佛教得到吐蕃百姓信奉的基础，是占据吐蕃正统宗教地位的前提。这就是吐蕃佛教能够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表面上看吐蕃佛教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占据了吐蕃社会的宗教舞台，成为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但是从历史宏观的角度看，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经历了松赞干布时期传入阶段，赤德祖赞时期的接纳阶段，赤松德赞时期的发展阶段和赤祖德赞时期的鼎盛阶段。如果没有朗达玛之前历代赞普的大力支持，甚至为之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佛教颇难在吐蕃社会生根、开花、结果，更不可能占据国教地位。

佛教的教义理论适合于吐蕃王朝的意识形态建设，故而从松赞干布开始翻译佛经，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第一次大规模译经工程结束，基本完成了《律藏》、《经藏》、《密续部》等佛教主要经典的翻译。在佛苯教理辩论中一举挫败了苯教，佛教的教义理论得到了吐蕃臣民的认同和信奉。

佛教寺院是佛教徒学法、修法、弘法和传法的基地。吐蕃佛教寺院是从松赞干布开始修建的，赤松德赞时期兴起修建佛教寺院的热潮。据《第吴宗教源流》记载“为了在吐蕃藏地奉行佛法，仿照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修建了12座学经院、6座祭神殿、8大修行地、4大修行院、12座清净院。”

“到了赤祖德赞（俗称热巴巾）时期又进一步扩大了寺院的规模，先后建立了闻、思、修三之修行院，讲、辩、著三之讲经院，慧、净、贤三之律仪院共30座寺院，以及建造了千座佛殿，十万座佛塔。据称此时吐蕃境内的仅佛教寺院就达1008座寺院”。^[5]从这些资料当中反映出佛教完全控制了吐蕃社会的宗教场所。

佛教僧侣是弘扬佛法和传播佛教的中坚力量。“由于赤松德赞为出家僧人不仅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社会条件，而且给每位出家僧尼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促使了吐蕃僧尼人数与日俱增。根据有关藏文史料记载：当时在桑耶寺讲经院，学经的僧众达七千人；在青浦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九百人；在昌珠寺，学经的僧众达千人；在央宗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有一百人；在大昭寺，学经的僧众达三千人；在扎叶巴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有五百人。此外，在康区、前后藏和阿里各地有无数僧众在学经修炼密宗，

仅就皈依女密宗大师益西措杰的弟子僧众就有三千多人，其中尼僧竟达一千多人”。^[5] 这些数字不一定具有真实性，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吐蕃社会的佛教僧尼，无论其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完全可以称得上佛教是吐蕃王朝主要信奉的宗教。

四、吐蕃佛教的文化地位

佛教是学术性、知识性和文化性比较强的宗教，所谓的学术性是指佛教的人生观、宇宙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哲学思想。知识性是指佛教理论学说在实践过程当中根据所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器物、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仪轨制度等方面的知识。文化性是指佛教具有的国家属性、民族属性和地区属性的文化个性。这是佛教向外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如语言而言，佛教传播过程中就形成了巴利文、梵文、汉文和藏文等语言和文字体系的佛教理论学说。

佛教传入吐蕃与藏语言文字产生了解之缘。吐蕃新创制的藏文是通过翻译佛经，以佛经为学习藏文的教材进行推广流行起来的。于是历史上藏文就成了主要为佛教服务的文字。吐蕃时期进行的三次藏文厘定工作都是使其更适合于梵文佛经的译经工作。藏文一开始就成了翻译佛经的工具，佛教语言本土化的桥梁。

藏文佛经翻译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时期“佛典翻译的译师中有印度人古萨惹、汉族僧人大天寿和尚、藏族译师图米桑波扎和尼泊尔人香达等。所译经典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等小乘佛典，大乘显宗和密宗内容”。^[7] 这些佛经就成了学习藏文的教材，在有意无意当中进行着佛教语言文字本土化，同时也向吐蕃臣民灌输着佛教思想和语言。藏文为佛教在吐蕃传播扫清了语言的障碍和隔阂，对佛教传入吐蕃和被吐蕃臣民接受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从印度、汉地等地邀请了许多佛教高僧到吐蕃，与吐蕃的‘七觉士’一起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还翻译汉地的医著和五行历算等。当时他们所译的佛经编目，先后编订成《丹噶目录》、《钦浦目录》和《庞塘目录》等”。^[8] 同时根据译经事业的需要，赞普敕

令厘定藏语，核定所译佛经，强化译经工作，要求统一体例，统一译语，使译文能够准确表达原本的含义，从而推动了整个藏文的改革，包括改进拼写规则，丰富词汇内容，完善语法结构等，在历史上被称为藏文规范化运动。这对提高藏文的使用功能和表述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吐蕃时期共进行过三次藏文厘定工作，其中一次是在赤松德赞时期进行的，后面两次是在赤热巴巾时期进行的。后两次厘定工作编辑了三部理论工具书，即《翻译名义大集》和《两卷本译语释》。这些翻译理论书或工具书都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中。随着佛教及其译经事业的发展，藏文自身也得到了规范和发展。吐蕃时期的藏文似乎被佛教高僧掌握，主要用于讲经传法译经弘法事业上。

佛教传入吐蕃，对吐蕃的建筑行业注入了新的建筑理念和运用技术。小昭寺、大昭寺、昌珠寺是西藏最早的大型寺院建筑，其建筑风格融汉、藏、尼泊尔和印度古建筑艺术为一体。

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也是西藏本土佛、法、僧三宝齐全的寺庙之祖，建筑布局仿照了印度古庙飞行寺的形式，并融合了汉地、西藏以及印度的建筑风格，故又有“三样寺”之称。乌孜大殿是桑耶寺的主要建筑，《王统世系明鉴》等藏文文献中载称“第一层（底层）按藏地样式用石造，二层（中层）按汉地样式用砖造，三层（顶层）按印度样式用木造。而且一切修建都符合律藏，一切壁画都符合经藏，一切雕塑都符合密咒。”乌孜大殿这种藏、汉、印合璧的建筑格调，在建筑史上颇为罕见。整个寺院呈圆形，桑耶寺整体平面布局完全是按照佛教关于世界结构的理论进行构思设计的。这种集聚多元建筑文化特点的吐蕃寺院建筑风格，对后来的藏族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

藏族造像艺术经历了以藏北加林岩画为代表的原始自然宗教时期，以阿里日土岩画为代表的苯教时期，吐蕃王朝时期以查拉鲁甫石窟艺术和寺院的壁画和雕塑为代表的佛教早期。佛像艺术随着佛教传入吐蕃，而且极大地推动和发展了吐蕃的造像艺术。同时吐蕃的造像艺术牢牢掌握在佛教徒手中，始终表现佛教的题材内容。

在吐蕃王朝 200 余年的历史上，佛教一直得到了吐蕃赞普的普遍扶持，其中以松赞干布、赤

松德赞和赤热巴巾表现尤为突出。这三位赞普在扶持佛教中都非常重视佛像的塑造与供奉。如松赞干布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尼中两位公主带去的佛像；赤松德赞建桑耶寺供奉汉藏印三种不同风格的佛像；赤热巴巾建温江多札希格培寺和噶迥神殿供奉佛像。由于赞普们对塑像的重视，当时大批的外国艺术家纷纷来到或被请到吐蕃参与塑像，有印度的、尼泊尔的、克什米尔的、斯瓦

特的、于阗的和唐朝的，使吐蕃的佛教和佛像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化经历了三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是苯教文化被推出历史舞台；其二是印度佛教文化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其三是吐蕃文化由世俗文化转向佛教文化。虽然吐蕃时期造像艺术所表现或反映的大多内容是佛教的，但是，它作为一门艺术却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巴卧祖拉陈瓦. 贤者喜宴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2) 藏族简史编写组. 藏族简史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61

(3) 五世达赖喇嘛. 西藏王统记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藏文版)

(4) 东嘎洛桑赤烈. 论政教合一制度 [M]. (陈庆英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

(5) 尕藏加. 吐蕃佛教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6) 冉光荣. 中国藏传佛教寺院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7) 雷镇闾, 林国汕主编. 佛教知识宝典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8) 扎雅·诺丹西饶, (谢继胜译). 西藏宗教艺术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7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Tibetan Buddhism

Lobsang Kai Zhu

(School of Tibetan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uddhism was imported from India and the Han to Tibe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ngtsan Kampo in the Tubo Dynasty.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senpo and the royal family ,Buddhism had not been strangulated by times of ‘banned Buddhism’ movements by the Tibetan aristocrats and Ministers ,and not been squeezed down by indigenous Tibetan Bon religion ,and eventually boarded on the status of orthodox religion in Tibetan society ,and won a very high courtesy and noble status. Buddhism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to the Tibetan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political ,econom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spects.

[Key words] Buddhism; Tubo; social status; research

(责任编辑 苏日娜)